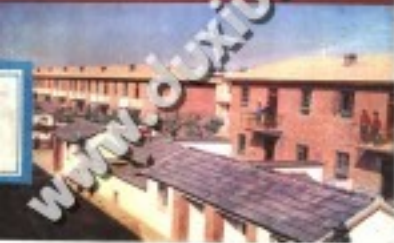




欣欣向荣的石家庄



插图：安丘县文化馆 王志隆
泰安师专美术系 张乃森

欣欣向荣的石家庄

张维荣 李向明 马宝山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35千字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3099·677 定价 0.16元

目 录

引 言.....	1
大地换新装.....	5
各业更兴旺.....	19
农业添金翅.....	27
科研开新花.....	34
崭新的风貌.....	44
幸福的金桥.....	52
光辉的前程.....	60

引 言

一九五八年八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人民公社这个在亚洲东部升起的太阳，发出了灿烂的光芒，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安丘县凌河公社石家庄大队的巨大变化，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为我们展示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二十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石家庄的干部群众，依靠集体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断发展生产力，把昔日“村前一条臭水沟，村北一片大沙丘，风吹黄沙压良田，庄稼十种九不收”的落后面貌，改造成了“渠道成网地成方，亩产超过一吨粮，农林牧副齐发展，欣欣向荣新景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十年来，石家庄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大提高。一九五八年，全大队只有一部马拉水车、一部喷雾器和其他简单生产工具。一九七八年，拥有汽车、拖拉机、柴油机、动力机械一千一百一十三马力，铡草机、扬场机、脱粒机、播种机等被动机械一百八十多台。从耕作、排灌到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操作。结束了那种“耕地依靠老黄牛，耩地人拉老木耩，浇地手摇辘轳头，抱起磨棍就发愁”的落后局面。

二十年来，石家庄的粮食亩产逐年上升。一九五八年亩产三百八十一斤，一九七六年亩产两千零五十一斤，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五倍多。一九七八年，石家庄战胜了百年未遇的

干旱，亩产仍达到一千八百四十一斤。

二十年来，石家庄林牧副业齐发展。一九五八年全大队只有大牲畜四十二头，猪一百零五头，树木三千棵，副业只有两项，农林牧副总收入七万元。一九七八年，全大队大牲畜发展到八十头，猪一千八百四十一头，植树十万零七千棵，副业发展到十四项。农林牧副总收入达到六十六万四千九百多元。公共积累由一九五七年的三万七千八百元增加到七十一万元。集体储备粮从无到有，一九七八年达到四十多万斤。

二十年来，石家庄的社员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九五八年，社员每人平均分口粮三百八十斤，分配收入六十五元。一九七八年，每人分口粮五百四十斤，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九十三元。社员吃菜、磨面、治病，儿童上学，看电影和电灯照明等都实行了免费。全大队有百分之四十多的家庭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二层楼房。

二十年来，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一九五八年，全大队向国家交售粮食六万五千斤，黄烟两万斤，肥猪一万一千二百斤。一九七八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五十一万五千斤，黄烟六万斤，肥猪十二万八千斤。粮食和肥猪的交售量，分别增长了八倍到十倍。

如今的石家庄，地肥畜壮，人们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可是，就是这个石家庄，解放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那时候，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九十六斤。全村一百一十七户，其中六十三户给地主当牛做马，七十二户逃荒要饭，二十一户卖儿卖女，五十二人冻饿死在外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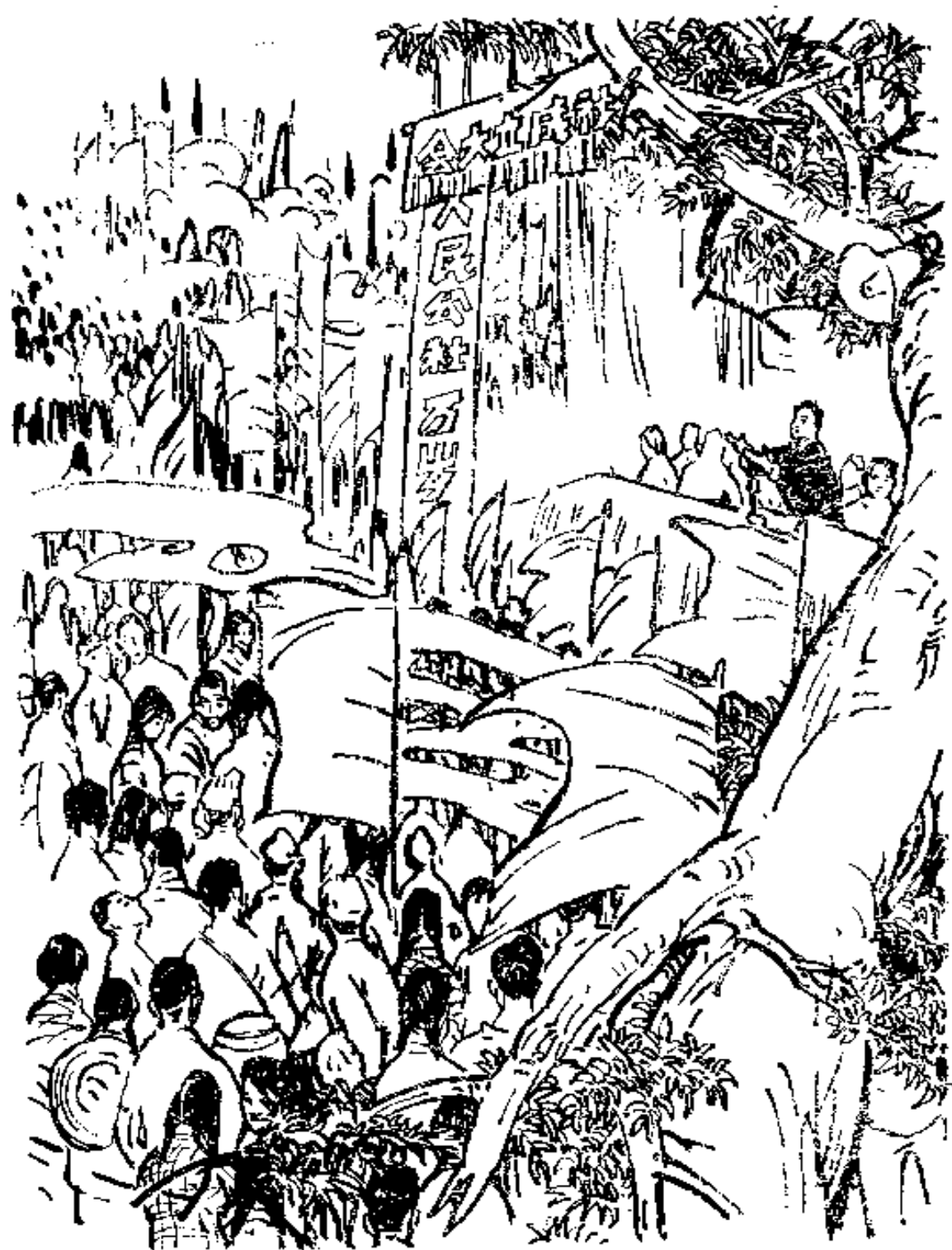
看现在，想过去，石家庄的广大干部社员，哪一个不歌

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赞扬人民公社这座通向共产主义的幸福金桥！

是人民公社为石家庄实现园田化、水利化和机械化铺平了道路，为大搞科学种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是人民公社使石家庄的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多种经营和队办工业蓬勃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社员生活步步提高；是人民公社使石家庄的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让我们满怀革命豪情，展开一幅幅壮丽的画卷，看看人民公社给石家庄带来的巨大变化吧！



大地换新装

人们常用“大地园田化”来形容石家庄大队自然面貌的变化。当你踏进石家庄大队，就会看到土地成方，机井棋布，渠道纵横。笔直的田间公路两旁，树木郁郁葱葱，庄稼乌油茂密，长势喜人。望着这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人们仿佛看到了石家庄的干部社员，二十年来为创建社会主义大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听到了他们在人民公社化道路上前进的脚步声。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促进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凌河人民公社建立了，石家庄大队的干部群众，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高举人民公社的伟大红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决心彻底改变过去“村前臭水沟，村北大沙丘，风沙压良田，十种九不收”的自然面貌。

石家庄地处汶河南岸，经常受到风沙的危害。冬春季节，狂风大作，滚滚风沙，把庄稼打毁。天长日久，便在汶河南岸堆积了二十六个大沙丘，石家庄大队的四百八十亩良田几乎成了沙海。人民公社化前人们曾想方设法战胜风沙，但由于插花地没有解决，只得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民公社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石家庄大队制订了征服风沙的规划。决定分两步

行动：第一步，沿河营造一条防风林，切断风沙来路。第二步，彻底搬掉几百年来形成的二十六个大沙丘，消除隐患，建造良田。

广大贫下中农听说要改造沙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都举双手赞成。封滩造林，需要大量树苗，一支由妇女和学生组成的百人采种子队伍，象辛勤的蜜蜂，采集了大量的刺槐等树种子，撒在苗圃里，育出了五万多株茁壮翠绿的幼苗。第二年大队党支部带领三百六十多人的植树造林队，在汶河沿岸建造了一条三、四里路长的防风林带。如今，这条防风林里的三万七千多棵树木，茂密葱茏，枝干挺拔，昂首耸立在汶河岸上，象一道绿色长城，锁住了狂暴的风沙。

锁“沙龙”首战告捷，他们又一鼓作气，搬走了二十六座大沙丘，平掉了十七座古坟，把多少年来的风沙灾害彻底根除了。

一九六四年冬季以来，石家庄大队党支部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决心学习大寨人，五年基本实现水利化，建设千亩大寨田，粮食产量翻一番。接着填平村南臭水沟的战斗就打响了。

臭水沟座落在石家庄前，从西南到东北，弯弯曲曲，全长三华里，宽二十六米。沟内有老凉湾、西沙湾、锁头湾等九个大湾。当广大社员正在填平老凉湾时，社员蒲在湖老汉出来阻拦。因为要从蒲家林高地上搬土填湾，老汉说什么也不依，他高声大噪地嚷道：“蒲家林的地，谁也不能掘！”

青年们都是些毛张飞性子，硬是不服，嗓门更高：“这

是人民公社的，你姓蒲的管不着！”

老汉气得眉毛胡子直哆嗦：“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正在这时，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永富赶到了。他制止住正在争辩的青年们，和气地问老汉：“这怎么算欺负人呢？”

老汉气噓噓地说：“你们看俺姓蒲的户数少，怎么也想糟践俺。掘了蒲家林，填了老凉湾，蒲子离了水活不成，俺姓蒲的也断了根，这……这不是欺压弱小民族吗？”

“欺压弱小民族？”吴永富心里不觉一震。这位拖了十几年要饭棍的老贫农，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他联想到这几年村里的阶级斗争情况，因石家庄姓吴的最多，阶级敌人经常用姓吴的是大户，蒲、王、石、李、宓是“弱小民族”的谣言，进行破坏捣乱。想到这里，他觉得这里面定有文章，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决定先把老汉劝回家，再过细地做工作。

可是老汉偏不走。他说：“我不中你的调虎离山计，我走之后，你们就把个蒲家林翻过来了。”

吴永富拉住他的手，十分真诚地说：“老伙计呀，在你的思想没搞通以前，决不在蒲家林动一锹土，你要是相信我，就回家歇着。”

老汉望望永富那严肃又诚挚的眼睛，转过身去，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吃罢晚饭，吴永富安排了一下工作，来到了蒲老汉家里。蒲老汉一家人正在吃饭，饭篮里放着焦黄酥软的玉米煎饼，菜盆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猪肉粉皮炒白菜，一家老小，又说又笑，充满着幸福甜蜜的气氛。

蒲老汉招呼永富在炕头上坐下，两人又啦起了当天下午

发生的事。

永富说：“咱哥们托毛主席的福，靠人民公社，才有了今天的好日子，可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啊！”

蒲老汉不吱声。

永富又说：“蒲家林是人民公社的土地，我们掘蒲家林填老凉湾，扩大耕地面积，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你说对不对？”

“对！”

“那么掘蒲家林的地填老凉湾就是欺压‘弱小民族’，是谁跟你说的？”

“谁也没跟我说，我觉得蒲草靠近水才能旺，你们掘了蒲家林，填了老凉湾，蒲草断根又缺水，这不是故意要破俺的风水，毁俺姓蒲的吗？”

吴永富望着这位在旧社会受了大半辈子苦的老贫农，痛心地点了摇头。他拉住老汉的手，充满感情地说：“旧社会，也是这蒲家林，也是这老凉湾，这风水给你带来什么呢！”

一句话勾起了蒲老汉的伤心事，在那昏天黑地的年月里，他一家人受尽了熬煎，蒲老汉的母亲死后，连个埋葬的地方都没有，父子愁的哀声叹气，只好趁黑夜偷偷埋在荒野里。地主知道了，硬说埋在那里破了他家的风水，立逼着把死人搬走，不然就得拿钱买下这块地。他明知道这是地主仗势欺人，有意榨他的油水，可又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卖掉仅有的三分菜园地，请了四桌子客才算了事。

想起这段辛酸的往事，蒲老汉止不住泪水横流。吴永富进一步开导说：“旧社会蒲家林靠着老凉湾，这风水给你带

来的是数不尽的灾难。看看新社会你家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难道是那‘风水宝地’给你的吗？不是，是毛主席共产党给你的，是人民公社给你的，再不要迷信那里的风水了！”

永富的这番话，把蒲老汉的心拨亮了。他悔恨交加，用烟锅狠狠地敲打着炕沿说：“我……我真糊涂啊，上了坏人的圈套了！”接着就揭发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他的封建迷信思想，散布“平南沟破了蒲家的风水”，“姓吴的欺压弱小民族”等等谣言。

顺着荷叶摸到藕。党支部以这活生生的事实，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群众的积极性更高，填臭水沟的进度更快了。蒲老汉拿着铁锨也来到工地，他一锨一锨地掘起蒲家林的土，填到老凉湾里。

严冬季节，北风怒号，大雪飘扬，工地上到处洋溢着热气腾腾的动人景象。

党支部书记吴永富驾着一辆两篓装得满满的车子，还仍然觉得不过瘾，又用树条子把车脊梁编起来，培上土，就象一座小山。人们怕累坏了他的身子，一位老贫农一把抓住他的车把关切地说：“永富，你要拚命啊！”永富笑笑没搭腔。老汉急了，“不行啊，你这身子骨，累垮了怎么办？”“放心吧，垮不了，身子骨越摔打越结实！”吴永富边走边答，车快如飞。

“说得对啊！身子骨越摔打越结实。”铁姑娘队长吴风珍接着说，她和伙伴们，有说有笑，就象小伙子一样猛，推车的，抬筐的，一点也不让男同志拉下。

雪越下越大，永富怕把姑娘们冻坏了，他把吴风珍叫到



跟前说：“风珍，你先领着姑娘们回家吧，随后俺们就散工。”

风珍笑而不答，她转身向姑娘们喊道：“姐妹们，咱们怕冷不怕冷？”

“不怕！”风雪中传来姑娘们坚定地回答。

“不行啊，姑娘们，天太冷了，会冻坏的！”永富关心地喊着。

“大寨铁姑娘零下二十度还不下火线呢！我们要学习大寨的铁姑娘！”姑娘们铿锵有力的回答，压过了狂暴的风雪严寒。

党支部副书记李宗泽推着车子走过来了，但他的脚下就象踩上了蒺藜似的。永富立刻走过去，问道：“宗泽，怎么啦？”

“鞋子有点不跟脚”，宗泽胡乱抠着鞋帮说。

永富想起这位当年的工兵连长，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爬冰卧雪，曾把脚冻坏了。他急忙上前说道：“快把鞋脱下来我看看！”宗泽推起小车就要走，却被永富伸手抓住了车把。

宗泽被迫把鞋子脱下来，永富一看，“啊”了一声！只见他那脚后跟上，裂开了道道血口子，上面用一根线缝着，殷红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

永富看了心疼。他一把推开宗泽，伸手把车禅上了自己的肩，转身对宗泽说：“快去歇着！”李宗泽哪里肯歇？他随手捡来一张镐，又吭哧吭哧地抡起来。三九严寒，天冷地冻，一镐下去只刨起来一块很小的地皮。吴永富和李宗泽鼓动大家说：“咱今天出大力，流大汗，为的明年多打粮，

不能光苦干，还得想办法巧干！”一说巧干，把许多人提醒了。复员军人吴树民看到每天上工后，要费很大劲刨开土塘的茬口，影响工程进度，便在每晚收工时，把土塘的茬口上加盖厚厚的干土，不让土塘结冰，第二天刨土用力少，进度快。铁汉子吴中华看到斜坡上的冻土用小车推，白白浪费装卸车的工夫。他找来打石头的铁钎子，和小伙子们在地上打了炮眼，利用铁钎把门板那样大的冻土，一块一块掀到湾里，节省了人力和工具。在吴树民和吴中华的启发下，工地上巧干办法越来越多，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冰化雪溶，冬去春回。石家庄的干部、社员大干了一冬一春，迎来了清明节。党支部决定放假一天，让大家过个佳节。可是，工程上了马，谁在家里也呆不住，都想早完工早受益，争取更大的丰收年。不多一会，人们又陆陆续续来到工地干起来。

大家干得正欢，忽听一个尖嗓门的小姑娘喊道：“哎，快看呐！”大伙顺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三队的五个新媳妇，扛着铁锹，咯咯地笑着走来。三队队长吴春海向她们喊道：“今天清明节，我不是安排你们走娘家吗，怎么到工地上来了？”

共产党员刘玉梅抢先答道：“这里比走娘家还热闹哩！俺一想到年底就要吃上咱这沟里长出的大米，谁也顾不得回家了。”

“你们不是刚过门嘛！”

“正因为刚过门没贡献，才更得下大劲赶你们哩！”

几个快嘴嫂子开玩笑地说：“真是女大外向啊，结了婚就光顾婆家不想娘家了！”

“哈哈！”人们说着笑着，你追我赶，大家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从平沙丘到填南沟，石家庄的干部社员整整奋斗了五个冬春。在这五个冬春里，他们共投工五万七千多个，搬动土石十一万多方，并把全大队一千二百亩土地划成了十八个大方，为向高标准的园田化进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石家庄的干部社员，继改土之后，与水又进行了持久不懈的斗争。

人民公社化前，石家庄庄小人少力量薄，有水源不能很好的利用，只能是水来随它淹，水去任它干。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们开挖了引汶自流渠道，修建了提水站，打了机井，换来了另一番景象：涝能排，旱能灌，水来水去随人愿，老天干瞪眼，龙王靠边站。

在沙丘没搬走，荒沟没填平之前，涝灾是石家庄发展生产的一大威胁。随着土地的整平，排水系统得到了进一步整修，涝的威胁已经基本解除，抗旱夺丰收就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九六七年夏天，石家庄近三个月没下一场雨，汶河断流，渠道干涸，庄稼耷拉了头，引汶自流渠道失去了作用。严酷的事实使党支部一班人认识到，搞农田基本建设，抓土不抓水，旱了跑断腿，抓土又抓水，丰收才有准。从那时起，石家庄干部社员学习外地经验，酝酿在汶河南岸修建一座提水站，把河底下的水抽出来浇地。

修建提水站需要组织一支专业队。党支部副书记吴中荣，支部委员宓藏山，带头报名打先锋，一支强壮的打井专业队伍组成了。

工程需要二十万斤石头，副书记李宗泽包下了这个差事。

他带着十三个人，扛起大锤，背起铺盖卷，进了离石家庄六里路远的蒲家埠南山。

还要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担任技术指导工作，大家扳着指头算来算去，选中了老贫农蒲奎。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提水站工程上马了。那是一九六七年的盛夏，吴中荣、宓藏山带领四十多名专业队员，顶着炎炎的烈日，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劈崖开沟，清基挖槽，他们奋战了十几天，一个八米半深、方圆一百零四米的大蓄水槽挖成了。

李宗泽和十三名社员在山上开石头，他们铺着地，盖着天，吃在山上，睡在山上，干在山上，奋战半个月，胜利完成了采石任务。

技术员蒲奎，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汉。自从担当了技术员，他日夜忙碌，严肃认真。别人休息了，他还在干，叫他休息，他说：“我手脚慢，多干点，不用歇。”别人收工了，喊他走，他说：“我手脚慢，再干点，您先走着吧！”别人不上工，他先来了，问他，也还是那句话：“我手脚慢，就得多干点！”

手脚慢，成了他的口头语，挡箭牌。其实他干得比谁都多，比谁都好，把心都操在提水站上头了，生怕因一点疏忽造成损失。图纸上的数字、符号、文字说明他看不懂，就让学生们念给他听，再不行就跑到学校里去问老师。晚上，他常常在灯下两手托腮，对着图纸出神，有时咕咕啾啾比比划划，一弄就是半宿。老伴见他眼熬红了，脸累瘦了，心疼啊！劝他早点睡觉，注意身体。他只是笑笑，毫不介意地说：“没事，为了建提水站，咱豁上这百十斤了！”

有一次，他进城办事，见城关公社的社员在修渠道闸门，就急忙走过去学，边看边问，不知不觉，太阳偏西，连回家吃饭也耽误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勤学苦练，他终于掌握了修建提水站的施工技术。

工程进行到修提水站的大闸门，老蒲奎感到责任更重大了。原图纸上设计的一个闸门，老蒲奎认为那样做费工费料，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又省料、又牢固的闸门，节约了近百元开支。在提水口处，原图纸上设计是直形提水，因水笼头堵塞不便维修，蒲奎就把它改为斜形阶梯式，这样上下方便，可以随时检修。他还在蓄水槽上建上提水口，槽边修上连环扬水池，可以使大小几台机器同时抽水。大家高兴地说：“咱们老蒲奎，不光能施工，还能搞设计，成了工程师啦！”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座半个流量的提水站建成了。提水站当年见效，使大部分土地浇上了水。这年的粮食亩产达到七百八十二斤。

石家庄的干部群众初步尝到了治水的甜头，他们的思想境界也随着斗争的发展，一步高起一步。有了提水站，一般旱灾没有问题，可是旱上一年怎么办？大旱三年能不能保证增产？大队党支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一致认为要作几手准备。要是再打上机井，把地下水挖出来，水利化就更保险，天大旱也不怕了。这个意见拿到群众中一讨论，贫下中农都积极拥护。党支部委员宓藏山又担当了打机井这个艰巨任务。他带领打机井专业队奔向第一口井的井场，随着吱吱悠悠的推杆声和社员们的劳动号子声，一桶桶黄泥沙被提上来。几天之后，第一眼机井打成了。人们热烈欢呼，奔走相告，忽

啦啦都围到机井旁，随着抽水机的嘟嘟声，一股清泉喷出来，顺着渠道，伴随着人们的喜悦，欢快地流向远方。

打井队日夜轮班，连续奋战一冬一春，打成了十二眼机井，后来又打了六眼。这十八眼机井，按照规划分散在一千二百亩土地上，浇灌着肥沃的粮田。

至此，石家庄开挖了引河灌溉、修提水站、打机井三个水源，汶河水大用自流灌溉，水小用机器提水，大旱时用机井抽水，水利这条农业的命脉到底被掌握了。

石家庄大队初步实现了大地园田化和水利化后，干部社员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又在向更高标准的目标前进！

拿土地来说。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他们对照先进单位的农田基本建设，揭矛盾，找差距，认为石家庄的土地离高标准的园田化还相差很远，还达不到高产稳产的要求。党支部一班人踏遍了全大队一千二百亩耕地，决定把十八个大方，逐块削高填洼，按千分之二之比降普整一遍，并要达到路、渠两边绿树成荫。还要逐年调换土壤，把村北的沙土推到村南粘土地里，再把粘土运到村北沙土地里，不断培养地力，向千斤田、吨粮田的目标前进。

这是一个不断前进、鼓舞人心的规划。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鼓起大家的干劲，党支部带领生产队长，到诸城县的沙戈庄、黄县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们看到，一方方一块块，整整齐齐，路渠如网，就象画上画的一样壮观悦目的大寨田，受到很大启发。许多人边走边说：“我们前几年搬了沙丘，平了荒沟，但比比先进的兄弟单位，我们出的力不多，流的汗也少，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轻轻松松变不了面貌，干社会主义就得出大力，流大汗，大干了再大干！”就这样，

石家庄又摆开了整平千亩园田的战场。

按千分之二的比降整平地面，首先要测量高低差，需要水准仪和掌握水准仪的技术员，支部书记吴永富自报奋勇承担了这项任务。他找来两个木工，用腊杆子做了个三角架，在支架上安一块平板，在板上挖了槽沟，用根玻璃管装上水做水准管，放在木槽里，然后用一个旧手电筒做成望远镜，镶在平板上，土水准仪就这样做成了。他又用竹竿做了简易标杆，拿到地里一试，效果很好。

为了加快工程的进度，他们采取了人、机结合，专业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两台拖拉机、八部马车、二十辆地排车、六十辆小推车全部出动，工地上，机器轰鸣，人欢马叫，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大干快上的繁忙景象。

民兵副连长吴中华，带领六十人的运土专业队，分成两个车子班，从村北把沙土运到村南，再把村南粘土送到村北，来回四里路，每天推三十多趟，行程一百二十多华里，运土近两个月，吴中华未歇过一天。

经过三个秋天的苦干，车子班每人行程两千多里路，运土一万四千多方。全大队通过削高填洼，深翻整平，把一千二百亩耕地全部按千分之二的比降整了一遍。

水利建设也是这样。水利工程由引汶自流到打机井，经历了三个阶段，配套工程也由低级到高级修改了三次。早在一九五九年，石家庄就在一千二百亩耕地里挖了干、支、斗、农四级渠道和修建了简易闸门。但是，那时的配套项目是极其简陋的，再加上地没有整平，渠道不仅漏水，而且每浇一遍地，闸门周围就有十多平方米的庄稼受损害。随着地面的整平，他们又整修干、支、斗、农四级渠道二十三华里，建

桥涵二十四个，闸门一百零八个，全部用石头水泥砌成，坚固耐用。为了防止渠道建成后塌方，他们将干、支、斗三级渠道的两侧，栽了三万八千墩腊条，避免了水冲土流渠道变形，还增加了经济收入。如今，在千亩园田里入水有干渠，分水有支渠，连水有斗渠，串地浇水有毛渠，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水利灌溉网。

“旱中有涝，涝中有旱”，这是天气变化的客观规律。石家庄大队在大挖地下水的同时，还做好了防涝的准备。他们实行排、灌统一规划，结合整修渠道，开挖了干、支、斗、农四级排水沟二十四华里，保证了遇涝及时排水。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这里在二十四小时内下了五百一十毫米雨，排水沟充分发挥了作用，大涝之年夺得亩产一千四百四十八斤的好收成。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今的石家庄，遇旱能抗，遇涝能排，排灌结合，旱涝并防。旱时，五天全部土地普浇一遍水，涝时，日降三百毫米雨不成灾，开始达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各业更兴旺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公社的建立，为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石家庄大队正是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带来了多种经营齐发展，农、林、牧、副更兴旺的蓬勃景象。人民公社化前，石家庄是单一的粮食生产。如今，建起了果园、养猪场、养鸡场、农机具修配、面粉、木业、砖瓦、石灰、塑料、毡厂等十四种副业和工业。一九七八年，年产值达到三十九万九千元，占全大队农副业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九。副业收入的增加，为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开拓了所需资金的来源。

石家庄村北有一条三华里多长的河岸，岸边有数百亩沙滩，很好利用起来，真是“摇钱树”、“聚宝盆”。可是，在公社化以前，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小，力量薄，很好的块肥肉吃不到嘴里，所以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一直没有利用起来。人民公社成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全大队对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田、林、路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一九五九年春天，大队党支部发动社员开发北河滩，使世代代没有动用过的沙滩乱石为人类造福，向荒滩乱石要宝要钱。他们先是在村东北沙石窝里，开出了二十六亩沙地，栽了三千多棵苹果树，后来又在河滩上植树造林，既防风固

沙，又供全大队用材。现在，果园已扩大到五十六亩，苹果树已发展到五千多棵，还增植了桃树、梨树、葡萄、红果、花椒等等，年产水果二十万斤，收入两万多元。汶河岸上营造的树林，年年提供一部分建筑用材。此景此情，使干部社员亲眼看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的高兴地说：“只有在人民公社化后的今天，才能让河滩献宝。”

一九六七年整地，大队党支部冲破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以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气魄，把八百三十八块地划成十八个大方，在方与方之间修筑了十一条路，并且路林结合，以增加收入。十一条田间公路和渠道两旁栽上的腊条、棉槐，当年就得到了收入。近年来，仅路边的腊条做成的杈和棉槐条子编织品，每年收入一万五千多元，相当于年产吨粮的四十多亩粮田的收入，路边的树木还美化了田野。石家庄的大地，真是风景如画。春天，十一条田间道路两旁，树干笔挺，枝繁叶茂，与渠道清清的流水交相辉映，生机勃勃；秋天，红透了的腊树叶，金风一吹，沙沙作响，与田间将要收获的庄稼互相衬托，一片宜人景象。到这里参观过的人，称赞石家庄是种地如绣花，大地美如画，使沙出金，土献宝，路旁渠道也是钱疙瘩。

二十年来，石家庄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五个生产队，队队有养猪场，每年集体养猪七百三十多头，社员家庭养猪一千一百多头。为了鼓励社员个人养猪，大队党支部年年检查养猪政策的落实情况，帮助社员解决仔猪和饲料问题，使养猪事业一跃再跃。一九七二年以来，全大队达到了一人一猪、一亩一猪。一九七八年达到平均每人养猪一点六头，为一九五八年的十七倍多。平均每年交售肥猪五



万九千多斤，收入三万一千多元，还积土杂肥四万三千多车。大队建立了养鸡场，每年向农业提供鸡粪一万五千车，向国家交售肉食鸡四十多吨，出售小鸡六万只，收入十三万六千多元。大牲畜也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七八年达到八十头，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仅养殖业一项，就占多种经营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九。

为了更合理的利用当地资源，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大队办起了砖厂、木业组、石灰场，兴建了日产三万斤的面粉厂，还有塑料厂、毡厂和缝纫组等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的副业项目。

石家庄大队在发展队办副业的同时，认真按《六十条》办事，积极组织社员发展家庭副业，既增加社会财富，又增加社员个人收入，还支持了大队和生产队办的副业。这样做，不仅是党的现行政策允许的，而且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但是，在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有人把这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说什么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就是“支持资本主义”。在这股妖风迷漫的时候，石家庄大队的社员家庭副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有的社员怕挨林彪、“四人帮”的棍子打，不愿议论社员个人养猪、养鸡的事；有的为了把所谓“资本主义尾巴”藏起来，公鸡打鸣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是不是“资本主义尾巴”？石家庄党支部“一班人”就是不服这个理儿。一九七五年年终工作总结时，大队党支部把《六十条》关于“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应该允许和鼓励

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口，发展家庭副业”的具体规定，发动社员讨论。大家联系本大队的实际，讨论了发展社员家庭副业是不是影响了集体生产的发展，算一算尽管家庭副业发展了，集体经济是不是仍然占绝对优势？这个大队一九七五年集体经济总收入四十二万九千四百元，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四万四千三百八十元，只占集体收入的百分之十一。三队社员吴德峰家的家庭副业在石家庄来说是数得着的。他家在一九七五年卖了五头猪，收入五百八十元，卖鸡蛋收入一百一十元，全家每人平均收入七十六元，而集体分配给他家一千六百零三元，平均每人一百七十八元，比家庭副业收入高一倍还多。这样一议论，大家是非清楚了，只要坚持搞好集体经济这个前提，社员搞家庭副业根本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同时还会给集体带来许多好处。比如，全大队社员养的猪和鸡，每年向生产队投肥一万六千多车，改良了土壤，增加了集体收入。再比如，过去大队养鸡场每年要花一万二千多元从外地购买小鸡，平均每只四角五分钱。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依靠社员家庭养鸡下蛋，自己孵鸡，两角五分钱收社员一个种鸡蛋，孵出的小鸡平均三角二分一只，每只小鸡的成本平均降低一角三分，每年可以节约近四千元。大家说，在搞好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搞好家庭副业，是一枪打俩眼儿，对社员有好处，对国家对集体也有利。是非清楚了，更加增强了大队党支部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决心。于是，规定社员每交售一斤猪奖给二斤半粮食，养猪积的肥料，以质论价，付给报酬。社员每交售一个种鸡蛋付款两角五分钱。大队积极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一九七七年，全大队社员家庭养猪发展到一千一百多头，向国家交售三百一十三头。养鸡一千二

百八十只，向养鸡场提供种鸡蛋十万多个。还向国家交售一部分家兔、鸡和鹅蛋等副食品。社员家庭副业共收入八万三千多元，平均每人七十一元。六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孙玉贞，一人在家看着两个孩子，做着五口人的饭，还喂猪喂鸡，一九七七年，她家向国家交售肥猪四头，收入五百六十七元，交售鸡蛋四百五十二个，收入一百一十三元，卖了两只家兔，收入三元多，全家平均每人收入一百三十四元，还向集体投肥三百一十车。

石家庄大队发展多种经营，始终坚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先办什么，后办什么，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都从农业的急需出发，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做到了想农业所想，急农业所急，办农业所需。石家庄大队在实现了园田化的基础上，一部分水利建筑物需要翻新，同时又大搞新村建设，每年约需要七十万块砖。这些砖如果到外地购买，每年要支出现金三万多元。大队决定自己建窑自己烧砖。在建窑过程中，没有技术员，他们到附近大队请来了一位师傅。十五个人奋战一个多月，就开始烧砖，一九七八年，共生产砖七十多万块，每块平均不到二分钱，为农田基本建设和新村建设节约了大批资金。

为了更好地支援农业生产，石家庄大队还积极扶持生产队发展各种副业。二十多年来，坚持做到凡是适合生产队经营的项目，都热情地扶持他们办好。大队明确规定：哪个队的地头、地边和路旁，由哪个队种植棉槐和腊树，收入归生产队。每年冬春季节，各生产队要办磨坊、粉坊、豆腐坊一类的农副产品加工作坊。由于大队的支持，石家庄五个生产队，队队有养猪场，队队搞大家畜繁殖。副业生产壮大了集体经

济，增加了生产队和社员的收入。第三生产队原来家底很穷，大队帮助他们开展了多种项目的副业生产，副业收入由一九六四年的一千四百九十元，增加到三千七百多元，既增加了当年收入，又扩大了公共积累。他们用逐年积累的资金，购买了拖拉机、铡草机、打浆机、粉碎机等被动机械和十三匹骡马，全队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粮食生产连年增长，一九七七年亩产达到一千九百八十斤，社员平均分配由一九六四年的每人七十五元六角，增加到一百八十一元三角。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石家庄大队发展多种经营的另一个特点。要发展多种经营，搞副业生产，开始是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三无技术。为了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发展副业生产，党支部书记吴永富给大家讲了两角六分钱办起一项副业的故事。合作化初期，石家庄干部社员想利用自己的苇子编苇笠。当时，社里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办呢？大家你拿个砖，我凑个麦根子，他拿一根檩条，自己动手盖起了五间地屋子。工具不全，有的社员回家拿来了菜刀和锥子。这项副业，从开始盖屋到出成品，只花了两角六分钱就办起来了。一冬天的工夫，收入了两千多元钱，合作社用这笔钱买了一匹枣红马。这个故事对大家启发很大，大家说，干社会主义，就要象大庆人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九六七年建砖、瓦厂时，垒瓦窑需用大批的砖，大伙儿一合计，就用土墼代替。大窑建成了，磕瓦坯没有搅泥机，买一台要花一千多元，群众一商量，没有搅泥机，用人工踹泥来代替。铁姑娘吴风珍，基干民兵李文信，首先脱掉鞋袜，挽起裤腿，带头踏进冰冷的泥里。当时已是初冬季节，天冷泥凉，他们为了尽快的发展集体经济，虽然

脚上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但他们全然不顾。就这样，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建立了砖瓦窑，每年收入一万多元。

自力更生的精神深入人心，大家动脑筋，想办法，一九七二年，大队要办一个年产四十吨肉食鸡的养鸡场，当时物料都比较困难。五个生产队齐心协力，自己解决了砖、石、木料和麦草，盖起了六十九间房子，每年出售肉食鸡四十多吨，收入十三万多元。一九七五年，大队要兴建一座面粉厂，为了节省开支，农机修配组蒲芹同志，主动承担了制造配件的任务，面粉厂需要大平筛，买一个要花五千多元，在有关部门老师傅的指导下，自己动手，只花了一千多元就造出了一个平筛。他又和修配组、木工组的同志一起，制造了面粉传送系统的白铁管和木制管道。再如，五十五马力拖拉机驾驶棚，买一个要花六百元钱，蒲芹说：“还是省一个算一个。”他买来铁板，量好尺寸，先用秫秸扎个框子，把铁板一块一块焊接起来，和其他同志一起，一气造出了六个拖拉机驾驶棚。还有瓦厂的压瓦机、石灰场的碎石机、砖场的煤渣粉碎机等，都是他们自修自造，大大节省了资金。

农业添金翅

多种经营的发展，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了条件。石家庄大队现有解放牌汽车一部，大、中、小型拖拉机八台，柴油机、电动机四十台，共一千一百一十三个马力，平均每亩耕地接近一个马力。收割、搬运、播种、耙耱、排灌等农机具一百零五台（件）。脱粒机、粉碎机、铡草机、磨面机等七十五台（件）。耕种、排灌、运输、脱粒、饲料粉碎和农副产品加工都实现了机械操作。十几年前，人们梦寐以求的“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浇地不用轱辘头，妇女不用抱着磨棍愁”的愿望，已变成了现实。社员们兴致勃勃地说：“现在是田里轰轰轰（拖拉机），井边嘭嘭嘭（抽水机），屋里亮通通（电灯），村里隆隆隆（机器），人民公社这条金光大道越走越有奔头。”

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人们就为了提高生产力，想机械化，盼机械化。当年拉滑车抗旱浇地时，许多人就曾望天长叹：“哎！要是能在河边安台抽水机，到时候机器一开，水就哗哗流出来浇地，该有多好啊！”可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小，力量薄，许多事情想办而办不到。人民公社成立后，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开辟了道路。在实现大地园田化和水利化以后，大部分作物由两年三作三收改为一年两作两收，耕作时间紧迫，劳动生产率低，与农活不相适应，迫切需要机械操作。机井和排灌工程的建

设，没有机械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大批妇女劳力也需要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这些新课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搞机械化。石家庄经过几年来多种经营的发展，为购置农业机械积累了资金，在这里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不仅需要，而且也有了可能。

那么，先从哪里“化”起呢？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用着什么买什么，思想上根本没有个数；有的主张先在农田耕作上化，提高劳动生产率，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有的则主张先搞农副产品加工机械，使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党支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认为最要紧的还是先在农业上化，既能迅速增加粮食生产，还可以节省出劳力投入副业生产和大搞科学种田。到一九七二年，已购置了十二台柴油机，八台电动机，十八眼机井全部配了套，结束了那种“小土井，轱辘头，天不下雨就发愁”的被动和落后状况，保证了高产稳产。一九七二年，石家庄遇到了大旱，三伏无雨，六月干河，引汶自流灌溉渠断了水，提水站滴水不出。他们靠十八眼机井，把玉米一连浇了六遍水，夺得了亩产一千二百七十斤的好收成，比大丰收的一九七一年增产一百二十斤。一九七八年，这里仍持续大旱，小麦从种到收没下过一次透地雨。由于有了电灌和机灌提取地下水的设施，仍夺得了亩产小麦一千零三十二斤的大丰收。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迫切需要运输机械和脱粒机械，他们又添置了大马力的拖拉机、电动机和脱粒机。到一九七五年，大、中、小型拖拉机已发展到六台，共一千零七十一匹马力，使田间和场间作业大部分由机器代替。为了充分发挥

机械的效能，他们还实行了一机多用，农副兼顾，农忙时用于农业生产，农闲时用在副业作坊，使所有的队办企业，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操作。

农业机械逐年增多，如何用好管好机械，更好地发挥农机具的作用，这是前进中面临的新问题。有一次，大队派拖拉机帮助兄弟队耕播小麦，司机反对说：“出去搞点运输，一出门就是八十元，给人家耕地播种，耗油多，还费力，是不合算的买卖。”党支部从这里感觉到，有了拖拉机，还有一个怎样用的问题。于是，针对这种思想，联系当时在林彪、“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社会上出现的什么“没有烟和酒，拖拉机不走”，什么“握了方向盘，腰里装满钱”等歪风邪气，向机务人员进行了方向道路的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解决拖拉机向哪里开的问题。为了建立起一支思想和技术真正过得硬的农机队伍，使农机具在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在狠抓农机队伍思想建设的同时，并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把一些思想红、作风好、积极劳动、热心农业机械化的知识青年充实到农机队伍中去。既组织他们学习科学技术，提高使用、维修农机具的技术水平，又组织他们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端正农机务农的政治方向。还开展了评比竞赛，实行奖罚制度，使农机人员的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汽车司机、拖拉机手普遍做到农机务农，保证质量，不吃请受贿，不乱拉关系，不谋个人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年来，他们每年都几次派出拖拉机帮助兄弟队耕播，受到上级党组织和兄弟单位广大贫下中农的鼓励和赞扬。

“机器不怕干活多，就怕坏了卧机窝”。为了加强农业

机械的维修和管理，杜绝“趴窝”现象，大队既抓买，又抓管，抓买又抓管，使用才保险。大队党支部经常对农机人员进行爱机教育，并建立了责任制，司机们每次出车回来，不管多晚多累，都要对机械进行检查和保养。他们在农机具管理中，基本做到了“三勤”（勤检查、勤保养、勤维修）；“四不准”（不准机械带病作业、不准超负荷作业、不准机手背“包袱”作业、不准非司机手操作）；“四不漏”（机械不漏油、不漏水、不漏气、不漏电）；“五净”（油净、水净、气净、机器净、机房净）；“五良好”（各部间隙调整良好、润滑良好、紧固良好、连接和电路良好、安全设备良好）。为了提高对农机具的维修能力，充分发挥农机具的效能，他们发扬“穷棒子”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维修机械的条件。他们把本大队的三个铁匠和一部分木匠组织起来，办起了农机具修配组，边学边修，随到随修，能制造就制造，使全大队的一般农机具小修中修不出队，保证了农机具的完好率。每年节省开支六千五百多元。现在，这个大队的农用机械，机车完好率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标准台作业量超过了上级规定的指标，耗油量也达到了规定的指标要求。

石家庄大队党支部还坚持用革命化统帅机械化，经常教育农机手和管理人员，发扬勤俭办社的精神，管好用好农业机械。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永富同志在停放拖拉机的车库里拾到了一只新的黄油嘴，他拿着油嘴，把司机手召集起来，给大伙讲了一九五三年石家庄靠两角六分钱办起全村第一项副业的事。他说，勤俭办社是传家宝，有了它，铁牛就是“摇钱树”、“聚宝盆”，丢了它，铁牛就是“无底洞”、



“填不饱”。他要求司机手学习本大队勤俭办社的放心会计吴春奎；学习一心为公的“铁保管”王庆吉；学习爱机器如爱眼睛的老贫农吴笛。经过不断教育，勤俭办社的好风气得到发扬，司机手和管理人员都象自己当家过日子那样，爱惜每一滴油，每一个螺丝钉，每花一角钱都要仔细算计算计。一九七七年，全大队从耕、耙、播种到田间运输，一亩地只花了一元七角钱，机耕机修费用大大减少。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石家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但使农业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对于转变干部和社员的小农经济思想，对于缩小“三大差别”也开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前，有些人不安心农业生产，有了机械化，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操作所代替，劳动强度减轻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人们觉得在农村，越干越有奔头。就说种小麦吧，没有机械操作的时候，全大队种七百亩小麦，男女老少齐下手，白天黑夜忙着干，全部种完得用四十天。现在种一千亩小麦，从倒茬到种完，只需要十多天就行了。收获季节，过去靠镰刀，靠人挑车运，快到嘴边的粮食，还常有被一阵大风刮掉，一场大雨淋烂的危险。现在，用机械收割和机械脱粒，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的损失。同时，机械用于农副产品加工，大大解放了妇女劳力。过去碾米、磨面全靠妇女，一个人一天满打满算磨四十斤。现在，用上了电磨，机器一呼隆，三万斤面粉够全村人吃二十天。缝纫组担负着全村的针线活，妇女们再也不用为缝补操劳了。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还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现在,石家庄已有七十多名农机管理人员,他们有文化知识,能熟悉所用机械的性能,上了机车会操作,拿起锄头能种田,成为有文化有技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

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一九七七年全大队一斤粮食的成本只合二分五厘钱,比一九六五年每斤粮食成本降低了将近一分钱。

科 研 开 新 花

石家庄大队农业的发展，还由于实行了科学种田。干部社员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种田，年年都有新道道。

人民公社化以来，石家庄大队是围绕着合理利用地力，大搞科学种田的。一九六四年以前，由于地力不厚实，这个大队的耕作制度基本上是一年一作或两年三作，影响了土地利用效率，粮食产量提不高。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为实行科学种田，大队拨出二十七亩耕地，选拔有生产经验的干部、老农和知识青年十二人，组成了科研队。科研队设有化验室、气象哨和良种培育、作物栽培、植物保护、虫情测报等几个小组，分别进行品种、肥料、浇水、作物不同密度、改革耕作制度和防治病虫害等科学项目的试验，并担负着土壤、肥料化验以及小麦、玉米两大作物各生育期中的土壤和植株营养分析。科研队既为大田提供科学种田的经验，又培养技术人才，指导大面积的科学种田活动。在科研队的带动下，各生产队也相继成立了三至五人的科学实验小组。

科研队认真学习和实践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着重抓了“土”这个主要环节。随着大地园田化和水利化的实现，土地质量越来越高，机械化又为农业科学种田解放了大批劳力，他们就把合理利用地力，实行间作套种，扩大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

为科学实验的课题。一九六九年，他们和第三生产队一起，在十六亩地里搞了地瓜与春黄烟间作，黄烟收获后套栽大葱，黄烟、大葱都长得很好，亩产瓜干一千二百多斤，黄烟八百斤，大葱两千斤。这一试验，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拄着拐杖赶来察看，他们拿烟袋量量烟秸，用手指量量烟叶，感慨地说：“科学办法多了，地也听话了，庄稼也信说了！”科技队的同志为了在大田进行推广，他们认真总结间作套种增产的原因：间作套种可以延长作物的生长期，提高单项作物的产量。比如夏播玉米、高粱、谷子，实行麦田套种，由于播种时间提前，相对地延长了生长期十天到半月，比麦后直播的要增产百分之十左右。间作套种可以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行间作、套种，把不同作物不同生长阶段合理安排，使前茬作物的成熟期与后茬作物的苗期相结合，同时生存，相互影响小，又可以增加复种指数，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或三熟。间作套种能合理利用良好的光照、通风和水肥条件，根据作物高和矮、喜光和耐阴、扩权和不扩权的生长特点，进行合理搭配，能够改变田间小气候，提高地温，降低湿度，增强作物对光能的利用率，有利于作物的正常生长。间作套种能充分利用作物之间互相有利的因素，例如玉米和大豆间作，可以改善玉米的氮素营养状况，窝瓜与花生间作，开始都在苗期，它们之间的空隙大，都互不影响，中后期瓜秧爬到沟底，略有遮阴现象，墒情好，有利于花生果针下扎，果实肥大。

根据科研队的经验，一九七〇年，全大队把一年两作两收的作物面积，由七百亩增加到九百多亩，间作套种的作物

面积，由五百六十亩增加到七百五十亩。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增产措施，大家在管理方面非常细心耐心，从春到夏，从夏到秋，社员们象菜农管理蔬菜那样，管理着全部庄稼。经过精耕细作，科学种植，科学管理，一九七〇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零六斤，比上一年每亩增产二百一十八斤。从此，他们搞间作套种的决心更大了，先后搞了粮烟、粮菜、烟菜间作，有的一年四作三收。一九七七年又在烟田间作土豆一百四十六亩。六月下旬，黄烟刚烘烤，土豆就收了，亩产八百多斤，黄烟单产六百多斤。黄烟收获后期又在烟垅栽上两行大白菜，每亩七、八百棵，亩产达到一万多斤。畦面再播种小麦，等白菜收获后再栽两行小麦或种菠菜，这样种植的各项作物都获得了好收成。这一年石家庄收获大白菜一百五十多万斤，除满足社员吃菜外，还支援城市一百多万斤。实行两作两收、三作三收和四作四收的间作套种办法，土地复种指数有的达到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粮食增长幅度也越来越大。从人民公社建立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〇年，十三年来全大队的粮食递增，每亩每年平均五十五斤。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提高了土地复种指数，每亩每年递增一百七十三斤。后六年每亩增产的粮食超过了前十三年增产的总和。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一九七三年，科研队要搞小麦过千斤的试验，开始他们认为，只要有好土地、好肥料和农药，又有足够的水，小麦过千斤是十拿九稳的。于是，他们选择了地块，在下种时，把“四合一”肥料每亩施了两万二千斤，施鸡粪四千斤，返青前普浇了一遍人粪尿，返青时每亩又追施了一百多斤氨水。从返青到灌浆，又浇了几遍



水，小麦长势良好。哪知扬花不久，一场雨加一场风，小麦倒了大半。科研队的人员全部出动，把小麦一棵棵扶起来，一气折腾了三四天。谁知歪倒的麦子刚站直，又是一场雨，刚扶起来的麦子又倒了。就这样，试验田的麦子三倒三扶，最后麦秸成了扁豆秧，架也架不起来了。结果，别的地块亩产八百七十斤，这块试验田亩产只有七百多斤。第二生产队有块四十亩名叫“蛇腰地”的麦田，年年产量很低。为了让低产田打出高产粮，有人向队长献计：“种地没学问，全靠水和粪。”队干部认为有道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追速效氮肥，谁知，小麦开始长势很好，麦黄期一场雨却倒伏了大半。收获时麦头麦秆一样沉，产量还不如少追肥的地块高。试验田和“蛇腰地”的教训，使科研队变得比较聪明了。一九七四年，科研队建立了土壤化验室，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进行土壤普查，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原来这几年，石家庄的土地经过改造和培育，地力比较肥了，土壤中含有效氮比较高，有效磷较缺，而科研队的试验田和二队“蛇腰地”的小麦，却偏偏多追施了速效氮肥，而忽视了磷肥，造成氮磷钾三要素严重失调，所以小麦减了产。

为了摸透石家庄土壤的底子，合理利用地力，土壤化验室的同志查遍了全大队一千二百亩耕地。在十八个大方田里设立了七十一个化验点，每年进行两次化验和不定期的进行土壤快速化验，并建立了田间档案。通过化验，初步掌握了地质、土壤成份和地下水位等情况。通过对小麦、玉米两大作物不同期生育所需要养分的化验，摸清了植株养分的变化情况。同时，对土杂肥、速效肥和水也都进行了化验，为合理利用地力提供了具体数据。每年哪块地种什么合适，该施什

么肥，怎么种，如何管，科研队都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为指导生产队实行科学种田提供了新的经验。

心里有了地力的底，施用肥料更合理。第一生产队“大沟林”一块地，由于缺氮缺磷，一九七四年亩产小麦六百零二斤。当年秋天，继续在这块地里播种小麦，生产队根据对土壤进行化验的情况，每亩施土杂肥由一万五千斤增加到两万五千斤，磷肥一百斤，小麦返青后，又追施氨水八十斤、硫酸三十斤，一九七五年亩产小麦达到八百零九斤，每亩比上一年增产二百多斤。由于掌握了地力情况，有些地适宜种什么，不适宜种什么就有了数。例如，沙土地钾和磷的成份比粘土地高，种黄烟就比粘土地病害轻，好拿色。第二生产队李家林有块地，一连种了四五年黄烟，虽然肥料没少施，但是黄烟的质量逐年下降。科研队的同志根据化验的情况分析：黄烟喜欢钾肥，李家林年年栽烟，钾的成份下降了，因此烟的质量一直不好。社员们一听在理，就调换了烟地，一九七六年亩产黄烟达到六百斤，比一九七四年每亩增产六十斤，烟的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

摸清了土壤的性质及其所含各种肥料的比例，就可以按照土地的需要，缺什么补什么，需要多少补多少。如村北的沙土地缺磷较多，就注意适当增施磷肥；村南粘土地与沙土地相比缺磷少一点，就适当减少磷肥量。沙质壤土吸热性强，是热性土，就注意多施猪粪、人粪等冷性肥。粘土地吸热能力差，是冷性土，就适当多施骡马粪等热性肥。掌握了土质状况和作物生长需要各种肥料的情况，就实行以地定产，以产定肥。一九七五年种小麦时，除选换小麦优良品种外，有的地每亩增施磷肥八十至一百斤，有的地增加了氮素化肥。

这一年，一千亩小麦没有倒伏的，亩产达到九百一十三斤，比上一年增产一百四十三斤。一九七六年，全大队的小麦又过了千斤大关。

心里有了地力的底，选种优良品种更合理。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先后引进了北京八号、济南四号、八号、九号等几个小麦优良品种。经过种植对比试验，在村南粘土地里种植北京八号、济南四号，比济南八号、九号增产潜力大，原因是粘土地肥力较差，喜欢丰产性能好、耐瘠薄的品种。相反，在村北沙壤地里种植济南八号、九号，增产潜力却高于北京八号、济南四号，因沙壤地肥力较强，土壤松软，喜欢能吃能喝又能长的品种。根据试验的结果，从一九七〇年以来，在小麦种植上，全大队基本做到以品种选地，因地换种，种植适宜，增产增收。

心中有了地力的底，实行密植也更合理。经过比较，村北沙壤土肥力高，适宜密植；村南粘土地肥力低一些，与村北相比就要适当减稀。近年来，他们根据地力肥瘦和土壤情况，确定作物稀密度。同时，还考虑到沙壤土是热性土，早发苗，早分蘖，年前分蘖多，种小麦时适当少下种；粘土地温度低不发苗，这样的地吃种量大，就适当多下种。

大搞科学种田，不仅使石家庄持续高产稳产，而且也培养了人才。科研队队长吴树成，从小爱好科学，在学校时，他曾搞过牵牛花嫁接地瓜，让地瓜结出了种子；搞土豆嫁接西红柿，也获得了成功。高小毕业后，党支部看他是棵好苗子，就让他到大队科研队工作。他来到科研队，决心把自己火红的青春，献给科学事业，为石家庄大队的作物高产稳产做出贡献。他平时口袋里装着书和小本本，随时随地注意学

习，记录各种试验效果和群众在生产中提出的问题。几年工夫，他先后读完了《土壤肥料学》、《植物生理》、《遗传育种》、《小麦》、《玉米》、《地瓜》等农业科学技术书籍，逐步掌握了科学种田的基础知识。一九七三年，他看到小麦锈病对增产危害很大，便在科研队两个小区作防治锈病的对比试验，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每天给小麦喷药后，他都要到地里观察好多次，仔细地作记录。这一年试验的结果，防治的比不防治的每亩小麦增产一百斤。几年来，他和其他同志一起搞过四十多个项目的试验，有些已获得了成功。一九七四年以后，全大队有些地块出现了小麦高产与倒伏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小麦播种到收割，每隔几天，吴树成和科研队的同志就踏遍全大队千亩麦田，作调查研究，虚心向老农请教。他们还做了稀播、浅播、培育壮苗、间苗、疏苗和增施磷钾肥等多种试验，摸清了由于大水大肥大播量，造成群体过大，个体发育不良，致使小麦后期倒伏的情况。吴树成大胆地提出了降低播种量，缩小群体，建立合理群体结构；培育壮苗，提高成穗率；实行根外喷磷，撒草木灰防止倒伏和加强小麦后期管理等技术措施，这些措施在全大队实施后，对小麦持续高产稳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七四年小麦亩产七百七十斤，一九七五年九百一十三斤，一九七六年亩产达到一千零三十一斤，一九七八年亩产达到一千零三十二斤，创造了小麦大面积丰产的新记录。

科学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有时为了搞清一个数据，吴树成宁愿晚吃饭，少睡觉，也得把事情搞清。一九七七年春节前，上级有关部门通知抗旱浇麦，当时地温和气温都在零下四到五度，小麦处于冬眠状态。为了

证明小麦在这时期是否需要浇水，吴树成在村东地里做了两个畦子的试验，他每天三次定时去测试温度，到了除夕，正是测试的最后一次，夜间，社员们家家户户忙着包饺子，放爆竹，欢渡春节，吴树成却一心用在试验上，他眼瞅着钟表的时针到了预定的测试时间，提起保险灯就走，家里的人说，人家都忙着过春节，你忙的是查地温，反正白天都查了，少这一次算得了什么？吴树成认真地回答：“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一个数据也不能少，一分钟也不能差！”经过他细心测量，正确的答案得到了：连日来由于温度下降，浇水对小麦根本没有利。这一年，全大队的麦田没有大面积提前浇水，小麦生长良好。

随着生产的发展，科研队化验室设备越来越多，对于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吴树成来说，要掌握这些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确实有不少困难。但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虚心向专业技术人员请教，自己刻苦钻研，不久就掌握了万分之二点五的分析天平、蒸馏离子交换器、电子烘干箱、千倍显微镜、微量滴定管等仪器的性能和原理，并能在实践中熟练使用。

经过几年实行科学种田的试验，不仅科研队的人员学科学、钻科学、用科学蔚然成风，而且大部分群众也养成了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共青团员、回乡知识青年吴树学，一九七四年春天在坡里浇小麦时，发现地头、地边和毛渠两旁的小麦锈病特别厉害，究其原因，他又发现野麦子是传染锈病的途径之一。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科研队，经过科研队化验诊断，认为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野麦子比一般小麦长得好，在朝阳的一面容易接受锈病病毒，当春天小

麦开始拔节时，也正是野麦子锈病的旺盛期，这时大量病毒沿渠道顺水下流，就使地头、地边、毛渠两旁的小麦染上锈病。科研队根据吴树学的建议，发动社员清除所有的野麦子，减轻了锈病的危害。三队会计吴春奎，也是一个学科学、用科学的能手。黄烟从育苗到采摘、烘烤、挑色等一系列科学管理技术，他都很熟悉，从一九六七年以来，他烤了二十三万斤黄烟，质量一直很好。五队保管员王庆吉，人称“革新迷”，近几年来，石家庄小麦年年长得比较好，套种玉米难度很大，王庆吉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制造了玉米点播器，既很少损坏小麦，又能加快套种玉米的进度。种小麦需要打畦埂，他又研制了机动推耙，工效比人工提高五倍多。今日石家庄的科学园地上，既有骨干头前带，又有群众紧紧跟，科学种田水平越来越高。

崭新的风貌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石家庄大队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自己先进，也满腔热情地帮助带动周围十三个兄弟队赶上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九七〇年以来，石家庄大队的粮食亩产已超过千斤，周围十三个兄弟队每亩产量平均只有四百二十多斤。为了帮助兄弟队赶上来，他们把人力、物力、经验等等，给兄弟队送上门。他们说：人民公社是大海，石家庄好比一滴水，石家庄再先进，也不如大家都富起来。从此，帮助兄弟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一九七三年夏天，久旱不雨，大地生烟，前仔林大队的三十多亩玉米地因为缺水不能下种，在这滴水贵如油的紧要关头，石家庄大队主动把自己的水井，让给前仔林大队用，自己却从一里路外提水站引水播种。一九七四年八月，石家庄和周围队都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水灾。大路大队受灾尤为严重，大片土地被淹，许多房屋倒塌。正在抗灾夺丰产的石家庄大队，看到大路大队的严重灾情，立即组织了五十多名整壮劳力，由党支部副书记吴中荣带领，给大路大队推土、托蟹、运石头，帮助社员盖新房，奋战二十一天，二十间新房平地而起。这些年来，每到争农时、抢火候的关键时刻，他们就派出拖拉机帮助周围兄弟队耕地、播种，最多一年帮兄弟队耕播土地四千五百亩。他们还把铡草机、柴油机、脱粒机、水泵等机械借给兄弟队用。派出汽车、拖拉机帮助运水泥、拉砖、送石灰。还为十三个大队培训了一批农机手。



石家庄大队不仅从物质上帮助周围队，更可贵的是向兄弟队传授生产斗争的经验。他们体会到，农田基本建设是实现农业高速度的基本功，是千秋大业，把这些经验传给兄弟队，比支援千元款、万吨肥的作用大得多。他们以切身的体会宣传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做法，宣传怎样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规划。一九七四年，在石家庄大队党支部的积极带动下，石家庄片十四个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调整插花地时，石家庄大队以身作则，把好地让给别的单位，把孬地调给自己。为了方便大家，他们把一个十一亩地的大湾也算作好地换过来，而把自己一个面积三亩多的大湾，无偿地让给了另一个大队。插花地调整了，石家庄又具体帮助兄弟队制订计划，安排劳力，向他们传授技术。使周围兄弟队也和石家庄一样，坚持冬春大会战，夏秋插空干，战天斗地改自然，他们大干三年，就基本赶上了石家庄十年农田基本建设走过的路程。

为了迅速提高兄弟队的粮食产量，石家庄大队把增产技术送上门。一九七四年，石家庄科研队把全大队的土壤进行了化验，发现普遍缺磷，他们搞了小麦增施磷肥的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第二年，他们就主动把全片的大部分土地进行了化验，发现都程度不同的缺磷。水泊大队的土地缺磷尤为严重，这个大队过去对施用磷肥不重视，常常买来磷肥换氨水。石家庄科研队把增施磷肥能使小麦增产的经验介绍给他们，有的人却不以为然，说：“我们这里是沙性地，再施上些石头面面不就更不增产了吗？”科研队长吴树成就多次到水泊大队讲解施用磷肥的知识，讲石家庄大队试验的结果，并亲自在水泊大队搞了小麦增施磷肥试验，用事实说服

他们。试验的结果，每亩施百斤磷肥的小麦比不施的增产一百零五斤。从此，水泊大队一改种小麦不施磷肥的旧习，注意用科学的办法种庄稼，从一九七五年以来，他们的小麦平均亩产每年递增八十多斤。

象传授小麦增施磷肥的技术一样，石家庄大队发展多种经营、科学种田、大搞农业机械化等经验，也都在周围兄弟队开花结果，生产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本大队干群之间，干部关心社员，社员爱护干部，干部群众互助团结，关系极为密切。有一年春天，二队社员李春其赶着马车刚刚出了远门，他爱人就病了。党支部和大队干部听说后，立即派出五名社员，由一名支部委员带领，迅速把病人送进县医院。等那位赶车的社员回来时，病人已经基本恢复了健康。这位社员看到集体给拿上钱，队里派上人给妻子治病，干部也在身边陪床，心里非常感动。他想，过去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有病有灾就象遇上了鬼门关。如今，在人民公社里，一人有困难，大家来支援，集体真正成了靠山。从此，他在队里干活更积极了，为了照顾好牲口，夏天，他特意把青草拔来，给牲口加草，冬天，他把自己吃剩的东西留下一些，给牲口加料，他热爱集体，积极劳动，多次被评为生产队的标兵。

八十多岁的老社员吴宗治，是大队的五保户。在旧社会，吴宗治受了半辈子苦，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公社化的道路，他热爱集体，以社为家，积极劳动，为集体事业贡献了一定的力量。为了使吴宗治度过幸福的晚年，大队确定专人对他照顾。五十多岁的社员石占宾，给队里管理着两万多斤地瓜种，为了节省人力，他又主动承

担了照顾吴宗治，一年到头为吴宗治打水、做饭、洗衣裳。后来，吴宗治得了病，石占宾就把铺盖搬到吴宗治家里，和他睡在一起，天天为他端屎端尿，煎汤熬药。吴宗治感动地对石占宾说：“百日床头无孝子，可我这绝户老人比有亲儿子还享福，咱虽是两姓，可比一家人还亲！”石占宾说：

“在人民公社里，都是一家人，你这人民公社的老社员过去为集体出了力，立了功，我们应该这样照顾你。”人民公社制度，就是这样把人们从思想上、感情上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平日里，谁家生病、有困难，婚、丧、嫁、娶，干部社员都是走上门帮助打谱，互相照料。在一个家庭里，长辈抚养幼小，子女尊重长辈，公婆关心儿媳，儿媳赡养公婆，已在全大队蔚成风气。

在石家庄，人与人之间是如此和睦可亲，离开石家庄，他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也同样是谦虚谨慎，可亲可爱。这里的干部社员，出门乘车让座，行走让路，自觉遵守公共纪律，对人讲礼貌，受到人们的赞扬。

人民公社，也是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大学校。二十年来，石家庄大队涌现出一批勇挑革命重担，一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关心群众生活的好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永富同志，坚定不移地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作一件根本性的大事。一九五六年，他当农业合作社主任的时候，就已经是全乡劳动出名的好把式。人拉犁，他套绳最紧；挖井抗旱，他在井底待的时间最长；挑土运粪，他的担子最重。社员们看他那样的拚命干，心痛地说：“永富啊，看你累得光剩下一把骨头了，你歇歇吧，地里的活我们误不了。”吴永富把嘴一咧笑道：“有骨头还愁肉？”人

民公社化以来，吴永富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吴永富学习大寨人，在改天换地的战斗中，处处打头阵，事事跑在前。石家庄成了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多次受到省、地、县委的表扬。在这期间，吴永富同志的工作职务也有一些变化。但他地位变了，劳动本色没有变，一年到头，他仍然和社员们一起大干不变架！

吴永富在劳动中是带头人，在生活中是社员知寒知暖的贴心人。第二生产队社员吴中详患阑尾炎，队干部一再让他到医院治疗，但他不听，在家求神烧纸，致使病情严重。吴永富听说后，立即派出干部社员，把吴中详送进医院，并安排专人陪床，直到把他的病治好。三队社员李文信的房屋漏雨，吴永富冒雨和李文信把东西一件件搬走，李文信两口子感动地说：“吴永富真是俺的贴心人！”

石家庄党支部成员，在吴永富的带领下，二十年来，对群众坚持“三上门”制度：征求意见找上门，思想工作做到门，访贫问苦走上门。冬天下雪，夏天下雨，社员们在家休息，吴永富和其他同志趁空到贫下中农家里了解情况；逢年过节，社员们在家团聚，党支部和大队干部就挨门挨户走访。干部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和群众亲密无间，群众不管有什么事，都乐意和他们说，有什么意见，都敢于给他们提。

干部处处把贫下中农挂在心上，对自己却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有一次，吴永富到大队瓜园买瓜，他照价付钱，看园的同志不收，说：“一个瓜值几个钱，快算了吧！”“不！”吴永富认真地说：“社员们都遵守队里的制度，不随便吃一个瓜，我更得遵守！”吴永富二十年来没端群众一盅酒，没

吃群众一顿饭，没有接受以任何借口送来的“礼物”。有一次，一个同吴永富一起搞互助组、办合作社的老贫农，儿子结婚，三番五次请吴永富去喝喜酒。好话说了千百遍，吴永富就是不去，老贫农火了：“我一不是四类分子，二不是找你办私事，这是喜酒，你喝一盅还‘修’了？”吴永富耐心地解释说：“喝一盅酒是修不了，可是先例一开，就不得了啊！我不去喝酒，不照样喜吗？”全大队的贫下中农都说：“吴永富为群众办事，把家家户户的门坎都踩亮了，就是茶碗、酒盅他不摸！”

象吴永富这样的好干部，在石家庄不只是一个，拉革命车不松套的“老黄牛”李宗泽、好队长吴春海、放心会计吴春奎等等，都受到人们的称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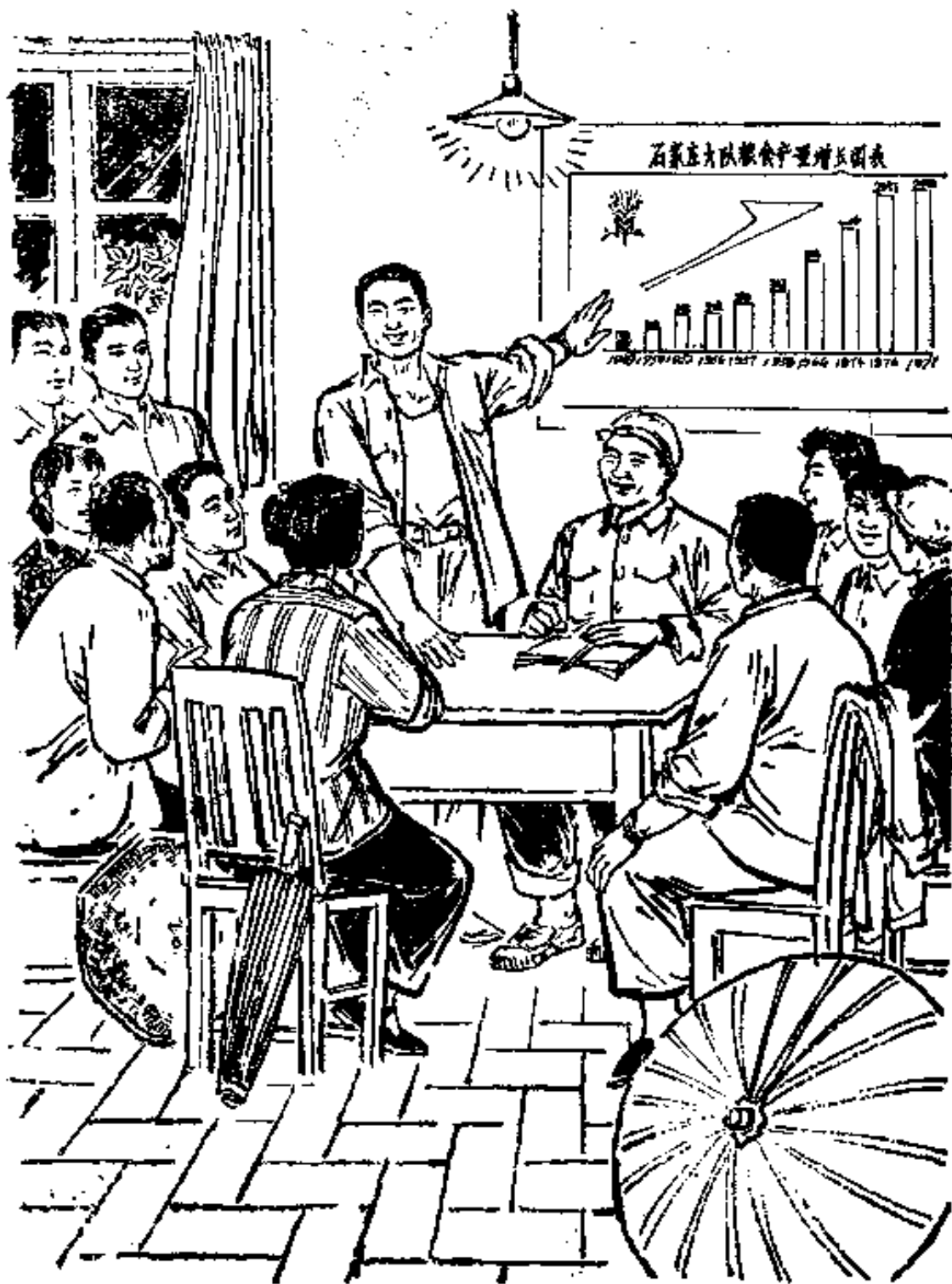
干部心正，社员心齐。“养猪迷”吴树芬，为了把集体养猪事业搞好，高小毕业后就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他不顾社会上那些“知识青年当猪倌”的流言蜚语，一心扑在集体养猪事业上。三伏天，他看到有的猪身上长癣，就每天用小车把猪推到河里烫洗；隆冬数九，母猪要下猪仔，他日夜守候在猪圈，给母猪生上火炉，垫上麦糠，把圈内搞得暖暖的。小猪仔生下后，吴树芬把小猪一个个抱到炕头上，用被子盖好，生怕猪仔受冻。猪仔一时缺奶，他就把喂小孩的奶粉拿来喂小猪。有一个时期，猪喘病在石家庄一带流行。小猪得了这种病，咳嗽不了几天，就瘦得皮包骨头。“克朗”猪得了哮喘病，光吃食不上膘。吴树芬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针对所了解到的猪的发病原因，做到经常保持猪圈清洁，勤打扫勤垫栏，用石灰水和来苏水喷洒猪圈。他还买了医疗器械，及时给猪治病。吴树芬还根据猪的脾性不同，把一揽子的喂法

改为分类喂养，按猪定料，分期增减，使各类不同的猪吃好吃饱，膘肥体壮。遇到特殊的猪，吴树芬用特殊的办法对待，一九七三年，队里有两头小猪经常不好喂食，为了引起猪的食欲，他做了又香又甜的猪食，精心调理喂养，一次两次，两头小猪的食欲不断增加，后来都长到二百多斤。由于吴树芬热爱养猪，精心管理，集体养猪业发展很快，猪的医疗费用也大大降低，由过去每年六百元下降为一百六十元。

幸福的金桥

“人民公社是金桥，共同富裕路一条”。二十年来，石家庄大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粮食亩产量一九七八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四倍多。经济总收入达到六十六万四千九百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八点五倍。随着生产的发展，他们对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加，一九五八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七万二千斤，平均每户五百一十斤，一九七八年，向国家交售粮食五十一万斤，平均每户两千四百多斤，比一九五八年每户增加三点八倍。黄烟、生猪的交售量，也比一九五八年有大幅度增加。二十年来，石家庄大队共向国家交售粮食四百七十三万三千斤，超过国家原定任务二百二十一万三千斤。交售黄烟二百一十九万五千斤，生猪一百六十三万斤，水果四十万斤，对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大队的集体储备粮也从无到有，逐年增多，一九七八年达到四十万斤，公共积累，一九七八年是一九五八年的十八倍。大队一级集体经济的收入，在两级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显著增长，由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五，上升到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一。

集体生产不断发展，社员的生活也相应的提高。口粮分配，强壮劳力干活多，贡献大的每年分配七百斤以上，一般家庭妇女、老人和小孩平均在四百五十斤左右，其中小麦占口粮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社员吃菜，由生产队集体种植管理，



种类多，产量高，按照口粮多少，随粮带菜，一律免费供应，每人每年平均供应韭菜、黄瓜、芹菜、西红柿等细菜三百斤，分配白菜、土豆、大葱、萝卜等粗菜三百多斤。生产队每年还种植一定数量的瓜类分给社员，每年的中秋节、春节供应每人苹果、香梨、葡萄等果品二十多斤。

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些劳力强壮，劳动积极，贡献较大的社员，每年得到的收入都比一般社员高。第二生产队社员吴树扬，四口人两个半劳力，一九七七年，他家分粮食两千八百零一斤，每人平均七百斤，比一般社员户每人多一百六十多斤；经济收入一千二百四十四元，平均每人三百一十元，比全大队平均数高一百四十元。另外，他家庭副业收入二百六十多元，平均每人六十五元，集体分配和个人家庭副业收入每人达到三百七十五元。分配蔬菜两千六百一十斤，平均每人六百五十二斤，比一般社员户每人多分配一百四十斤。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公共福利事业项目也越来越多。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生活全由大队里包下来，他们不用为生活担忧。孤寡老人李桂臻六十多岁了，基本不能参加劳动，一九七七年，大队照顾她工日一百三十四个，分配给口粮五百九十四斤，蔬菜三百五十斤，还有一百零一元钱。她家养着三只母鸡，每年收入四十多元。对病残的社员和少年儿童，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使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女社员王顺兰一人拉扯着五个孩子，大的十四岁，小的才三岁，六口人只有半个劳力，一九七七年，全家分得口粮两千七百五十四斤，还分得现金八十六元多。家庭副业收入八十六元，中秋节、国庆节还分配水果七十多斤，全家吃

粮、吃菜、零花钱都比较充裕。五个孩子，除两个幼儿，其余三个都进了学校。

“人民公社是金桥，共同富裕路一条”，公社化前的那些老中农，也都从内心里赞扬社会主义好。老中农吴永广，解放前一家五口人，两个劳力种着二十亩地，养着半头毛驴，一头猪，有木犁一张，木楼一把，一辆木轮小车和杈、耙、扫帚、扬场锨。全家人住着正房三间，偏房两间，家中有柜子、箱子两套，全家有被褥九条。一年的粮食收入和支出是，粮食五千四百斤，交捐税以及雇短工用去两千斤，打油买盐等日常生活支出一千斤，实际剩下的口粮只有两千四百斤，每人平均四百八十斤。现金收入，卖猪、卖鸡蛋等共有一百二十元，平均每人二十四元。在吃穿方面，虽比贫下中农好一些，一年四季也仅是吃高粱掺糠皮的粗煎饼，逢年过节，有时连顿纯白面的饺子也吃不上。而现在，他全家七口人，有四个整劳力，每年为集体劳动一千五百个工日。他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几年来每个工值分配一元三角，全家每年收入一千九百五十元，分口粮四千五百五十三斤，每人平均六百五十斤，分蔬菜三千九百斤。全家经济收入，除去口粮折款，还有一千二百四十四元，加上家庭副业收入七百三十元，共一千九百七十四元，每人平均二百八十二元。全家住着集体兴建的楼房六间，偏房两间，家里有两个大立橱，一个桌橱，一张写字台，三张抽屉桌，柜子、箱子四套，椅子四把，暖水瓶四个，被褥二十五条，自行车两辆，手表两块，挂钟一架，闹钟两只，院子里有压水井。吴永广感慨地说：“论今天的生活，要与过去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拿过去的三个中农我也不换哟！”现在的石家庄，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

存款总额达七万多元，平均每户三百三十多元。全大队的社员有手表五十九块，怀表八只，座钟、挂表八十九只，闹钟二十六只，缝纫机六十五架，自行车九十八辆，收音机一百零三部。广大干部社员抚今忆昔，无不充满了对党的无限感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热爱，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充满了信心。

由于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石家庄大队的社员住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合作化以来，全村三百多间旧房已全部进行了翻新。翻新的房屋大都是砖、石根基，麦秸盖顶，石灰泥墙，坚固洁白。这样的房屋，现在正被二层的红色砖瓦楼房所代替。从一九七四年以来，大队对社员住房进行了统一规划，由大队每年从公益金中拨出部分资金，为社员建造住房。新盖的砖瓦楼房宽敞明亮，每户一个院落，按人口多少，有的住楼上三间、楼下三间，有的住楼上楼下各两间，平均每户居住楼房面积一百零八平方米。楼房都有阳台，有玻璃窗。与楼房配套的还有院墙、门楼、影壁、厨房、火炕、厕所、猪圈、鸡窝、兔子窝等等。另外，还有一部分平房，平均每户占有居住面积五十平方米。现在，石家庄已盖起楼房三百五十一间，平房四十一间，有百分之四十多的户搬进了新居。社员们住上这样宽敞明亮的房屋，解除了终生为居住操劳的负担，倍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社员孙玉贞饱经旧社会的风霜，解放前，她家八口人，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住着地主的三间草房，一块席头铺土炕。冬天，屋外北风响，屋内雪花飘。寒冷、饥饿夺去了她家五口人的生命。现在，她家有五口人，祖孙三代住着六间楼房，炕上摆着八套花被褥，还有毛毡、毛毯，生活舒适，老少亲切和睦，一家人早

出勤，晚收工，积极为集体作贡献，全家有三人被评为先进分子。

随着大队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有的穷队也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向先进队看齐。第五生产队是全大队经济基础较薄弱的—一个队，一九七五年，大队拿出部分资金帮助五队添置了农机具，并增拨了一部分化肥。在大队的扶持下，第五生产队的面貌迅速改变，一九七六年每亩增产粮食二百二十一斤，社员分配每人平均增长了二十元，大大缩小了同收入较高的生产队的差距。

几年来，大队还兴办了一些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公共事业。计有：修路十一条，建桥七座，修水利建筑物二百零四个，建土圆仓二十个，购买电影放映机、电视机各一部，建教学楼一座，卫生所一处，还建立了土壤化验室，添置了价值近万元的科学仪器和其它设备。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使石家庄大队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进一步发展提高。大队有一处十年制的学校，新建了两层共三十八间的教学楼，设有两个高中班，两个初中班，五个小学班。在校学生四百零二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百分之九十八，学生上学全部免费。几年来，学校培养了三百多名高初中毕业生，为各条战线输送了人才。他们当中有的参了军，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当了工人。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有的当了拖拉机手，有的当了科研队员，有的当了生产队长，他们都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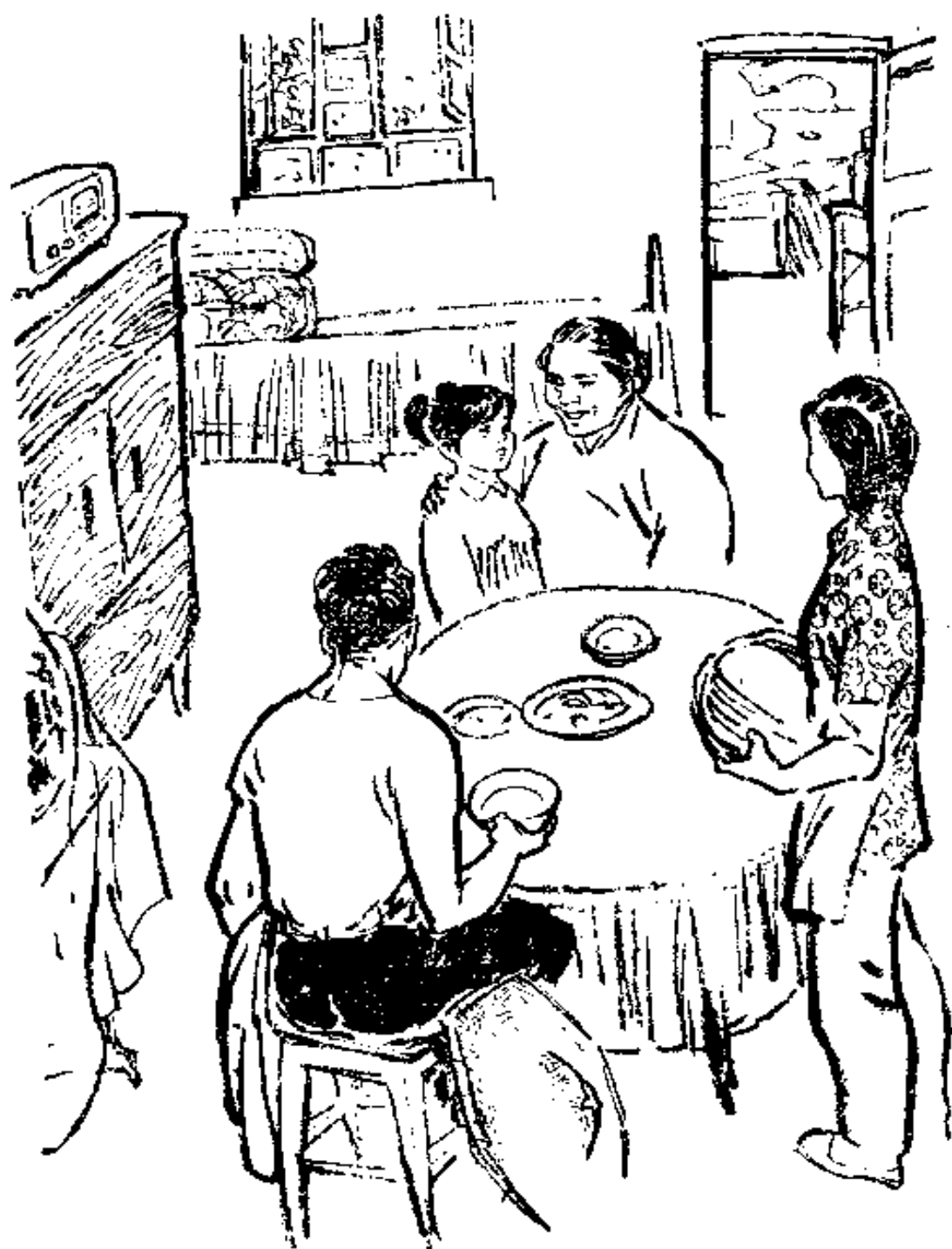
另外，大队还举办了夜校，图书阅览室，业余文艺宣传队，电影放映组，每天晚上，社员们在通明的电灯下，有的夫妻同识字，有的老两口学文化，青年小伙和姑娘们学

科学，学技术，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人民公社化后，石家庄大队的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一九五八年，大队办起了卫生室。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又办起了合作医疗，社员实行免费治病。大队配备了三名赤脚医生，生产队里有卫生员，形成了医疗网。他们带领群众除害灭病，讲究卫生，搞好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等医疗卫生工作。贫农社员蒲美红，合作化前得了慢性病，由于经济比较困难治不起，长期被疾病折磨。自从实行了免费医疗以后，情况大不一样，一九七六年腊月的一天深夜，蒲美红突然得了偏瘫病，口眼歪斜，右侧上下肢瘫痪，大队赤脚医生吴树宝日夜为他治疗，先后服用一百二十多付中草药，经过八个多月的精心调治，蒲美红完全恢复了健康，所用一百六十多元的医药费，全部由集体负担。

大队卫生所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大搞了以“两管”（管饮水、粪便）、“四灭”（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五改”（改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大改变了大队的卫生面貌，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社员的健康水平。

为了把合作医疗办得更好，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大队盖起了有四十九间楼房的卫生所，设立了门诊室、内科、外科、妇产科、手术室、化验室、透视室，有十张床位的病房。干部社员定期检查身体，发现疾病，及时治疗，使广大社员身体健康有了可靠的保证。



光 辉 的 前 程

石家庄大队二十年的发展变化，是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真实记录。回顾过去的战斗岁月，展望新时期总任务的光辉前景，这个大队的干部社员对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更加充满信心。他们决心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以生产斗争为中心，进一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在今后的几年内，普整一遍地，建成高产田，实现高标准园林化；水利达到机灌与喷灌结合；搞好农业机械的配套，进一步提高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改良品种，实现种子良种化，栽培科学化。粮食产量，一九八五年亩产达到两千五百斤，每人向国家贡献一千斤；多种经营收入达到一百万元，平均每人二百元；公共积累达到一百万元。要在近两年内完成新村建设，使社员全部住进楼房，用上自来水。并办好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建立展览馆、图书室、文化室、劳动人民先进事迹展览室。

回顾过去，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斗志更坚。石家庄大队的干部社员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奋勇前进！

